

通往人的自主和尊嚴的道路 ——重溫林毓生先生的學術與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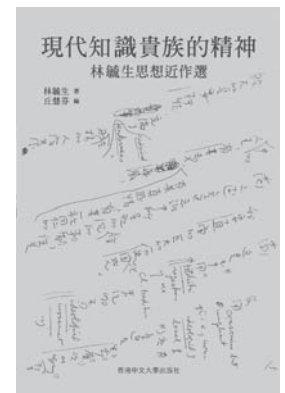
The Road to Autonomy and Dignity of Human Beings:
Revisiting the Scholarship and Thought of Prof. Lin Yu-sheng

唐小兵 (Tang Xiaobing) *

2022 年 11 月 22 日，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學者林毓生先生在威斯康辛溘然長逝，至此，旅居美國研究中國思想與文化史最傑出的、1930 年代出生的三位華裔學者余英時、張灝和林先生都先後離開人世。這無疑是思想文化史領域的重大損失，也留下了難以彌補的空白。不過，三位先生都留下了精湛、淵博而有原創性的學術論著，我們可以通過重溫這些作品的理路、心路和言路，與他們進行跨越時空的對話。三位前輩學人中，我與余先生交往稍多一點，與張灝先生也至少有過一下午的私下談話，而與最後去世的林先生儘管見過數次面，但都是在他講學的場合，並無私交。如今我也只能從一些細微的視角和學術思想的角度來重溫他的思想生命，也算是表達一個 70 年代生人，對於林先生這一代學人的深切哀悼和由衷感恩，我們這一代學人因緣際會託福於中國大陸與港、臺及海外學界的正常學術和文化交流，而深深得益於從海外更專業、同時具有深切價值關懷的學術世界汲取滋養心靈的智慧。

林先生曾經在為其導師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 教授的〈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太陽底下的一樁新鮮事〉撰寫的導讀裡寫道：「邁向有意義的人生的第一步，就是不怕犯錯，並為自己的錯誤負責。事實上，衡量一個人成熟與否，要看他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如何而定。這才是通往人的自主和尊嚴的道路。」¹ 人的自主和尊嚴，以及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自由、包容與多元，始終是林先生關切的核心。他一生的學術與生命的脈絡若以其弟子丘慧芬教授撰寫的思想傳記主旨而



* 作者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¹ 林毓生，〈史華慈著〈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太陽底下的一樁新鮮事〉導言〉，收入：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頁 355。

言，就是「自由的追尋」。²這不僅僅是基於英美憲政民主架構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基礎之上的價值關切，同時也是在一個價值多元甚至諸神之爭的時代，尤其是在經歷了漫長革命的 20 世紀中國，個人如何仍舊保持內心的精神自由和心靈自由之省思。

早在林先生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攻讀博士學位的時代，其臺大時期的精神導師和學術領航人殷海光，曾在給他的信件中憂心忡忡地談及五四胡適、陳獨秀等知識人在全盤性反傳統運動中對於自由和解放的誤讀：

五四人的意識深處，並非近代西方意義「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這二者雖有關聯，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們所急的，是從傳統解放，從舊制度解放，從舊思想解放，從舊的風俗習慣解放，從舊的文學解放。於是，大家一股子勁反權威、反傳統、反偶像、反舊道德。在這樣的氣流之中，有多少人能做精深謹嚴的學術思想工作？新人物反舊，舊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蕩，意氣飛揚。防禦是尚，於是形成兩極，彼此愈來愈難作理性的交通。一九一一年以後的中國就沒有日本那樣的穩定的社會中心，以及深厚的中間力量。加以左右的政治分化和激蕩，更是不可收拾，正在此時，日本從中橫掃，遂至整個土崩瓦解。³

這段話可謂是林先生一生之中對於自由與解放、自由與權威關係思考的隱秘通道。他始終念茲在茲的是，奠定自由主義者的底色和厚度的價值資源應該從哪裡汲取。他關切的是在一個不再令人著迷的世界（與王元化先生的通信中提出的經典命題）裡，作為一個現代人，如何擺脫「技術肥腫，倫範消瘦」（殷海光語）的時代處境裡「大腦發達，而心靈萎縮」（張灝語）的命運。就此而言，林先生與余英時、張灝兩位先生一樣，一生都在

以純粹而專業的現代學術工作方式，追尋現代中國的自由、平等與民主的政治框架和精神資源建設路徑，可以說是殊途同歸於對一個既有自由主義的政治基礎，同時又灌注了文化傳統中優秀遺產的文化中國的追尋。

這些深邃的學術思考，對於活在漫長的過渡時代而兩頭不到岸的我們而言，自然深具知識和價值上的啟示。就前文所引述的殷海光信件內容而言，如何從一個為反對而反對的狀態中突圍，超越越反對越跟反對物件趨近的文化悖論，進而建設一個多元、自由而理性的公共文化，也是林先生始終關注的焦點。他認為這種類型的公共文化才是一個健康的政治體系的基石，也才能真正地捍衛人的自主與尊嚴。林先生深受殷海光、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希爾斯（Edward Shils, 1910-1995）、史華慈等中西一流學者的影響，進入了最深邃而有生命力的學術譜系，他也強調這種學術權威（是他所言的心安理得的權威，而非壓制性的虛假權威）對於一個學者的成長極具正面導向的價值，他也因此多次在文章和演講中宣導知識貴族的尊嚴。

在經歷了以平等為主要訴求的共產革命中國，反精英主義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政治觀念和社會思潮，「貴族」、「精英」等自然成了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頭銜。揆諸歷史和現實，我們會發現林先生宣導的這種知識貴族的尊嚴和價值，其實對於提升一個社會的公共文化價值、層次和活力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具有家國天下情懷的士大夫傳統的現代形態。在一個祛除了知識貴族的平庸時代，虛假的平等主義往往為學術贗品大行其道打開了潘朵拉魔盒，學術就成為了發表的競賽和工具理性導向的名利場，曲學阿世和侮食自矜的人自鳴得意，而有底線和自主人格的學人就成為了沉默的少數。在華東師範大學求學、教學的二十年中，我曾經在「史華慈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屆中國思想史研究高級研修班」等場合聆聽過林先生的發言或專題講座，他對於學術工作態度上的虔誠和嚴肅，讓聞者

2 丘慧芬，《自由的追尋：林毓生的思想與生命》（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3）。

3 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 重校增補本），頁 211。

為之動容。我至今記得在 2006 年冬天的麗娃河畔召開的史華慈紀念會議上，林先生發言中時有停頓，陷入思索狀態。他往往是在進行緊張的思考尋找更恰當的詞彙和論式以表達他的見解，在超時被提醒的情景下，他要求稍微延長時間，讓他得以完整地表達自我的看法。而在思想史研修班上，他在與學員討論的環節，面對一個青年學人提出關於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的看法時，他突然極為嚴肅地批評這個青年人對於政治思想意義上的自由的誤讀和歧見，會場氣氛突然陷入一種極度緊張的狀態。當時自己還頗有點為學員鳴不平的同情感，如今回想十多年來學術界鄉愿心態盛行、玩票主義瀰漫的不堪，深深地覺悟到：捍衛學術的嚴肅和尊嚴是需要這些前輩來身體力行的，如此一來，一些年輕的初入門者才會有所敬畏，才能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也才會有所依託和傳承。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術反思，還是學術的世代傳承而言，我都較為認同林先生這種擇善固執的「木強」個性和態度。自然，我所認同的正是林先生宣導的「心安理得權威」，而非「壓制性權威」。後者往往是依靠掌控了學術資源乃至政治權力而倚老賣老，用恐嚇、利益贖買等各種方式來套牢、馴服年輕學人。我曾經對此反思：「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的學院體制，完全以另一種面目呈現，高壓性的政治管控開始隱性化，工具理性開始主導學院體制，追求美好生活成為學院裡的主流價值，有信仰和操守的知識人幾乎是沉淪在一個找不到敵人的『無物之陣』之中，以競爭為理由大學陷溺在瘋狂的資源競賽之中。」⁴

就林先生的著述對中國大陸學界的衝擊和影響而言，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林先生最早引入中國大陸的學術論著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這本書 1986 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許醫農編輯出版後，一紙風行，洛陽紙貴，成為當時眾多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傳統與現代化、中西思想比較、反傳

統與革命等主題感興趣的讀書人共同捧讀的作品。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名學者蕭延中曾經跟筆者談及，《中國意識的危機》除了在歷史認知和文化反思的層面有深遠影響之外，在引導中國大陸年青一代學人重新認知學術寫作的典範與標準也有突破性意義。在 1980 年代的文化熱中，儘管也出現了諸多本土學人的著作，但大多都是大而化之的宏大敘事，涉及史學的論述也缺乏嚴謹的邏輯論證和史料支撐，論著中立場和態度往往成為壓倒性的標誌，更無論之前在意識形態控制下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狹隘甚至扭曲理解。《中國意識的危機》雖然篇幅不大，但其論證框架的嚴密、問題意識的敏銳、歷史反思的深入以及徵引文獻的細密等，給了當時的學者以巨大的刺激。如果套用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話來說，這一波影響導致了學術寫作的典範轉移，到了 1990 年代終於開花結果，也即王元化先生後來所概括的「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⁵

此外，這本著作以胡適、陳獨秀和魯迅作為三個個案所提煉的整體主義反傳統認知模式，尤其是這些反傳統運動在林先生看來：「辛亥革命以後，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的確演變成了一個整體觀的思想模式，從而使它變成一個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工具，它將中國傳統看作是一個其性質是受中國傳統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機式整體而加以抨擊。這種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潛在的整體觀，是在各種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響下才形成的。這些因素是：五四反傳統主義者對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道德所採取的懷疑和否定的態度；對辛亥革命失敗的激憤；他們的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情操；對社會政治和文化進行根本改革的迫切要求，即對建立一個基於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學價值的新中國的渴望；由於袁世凱的無恥篡權和夭折的帝制運動和張勳的復辟而使他們產生的對整個社會邪惡勢力的深刻認識；以及他們對中國傳統的中心價值體系的極度疏遠。」⁶之前中國大陸學界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考、研究和寫作，儘管也試圖突破意識形態的教條，但正如孫

4 唐小兵，〈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精神貴族還是知識工人？〉，《十字街頭的知識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 70。

5 參見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

6 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頁 47-48。

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樣，提出的問題仍舊是在固有的思維格式之內，可謂「盤中走丸」，如今因為林先生這套歷史論述的引入，終於可以「別開生面」地從多重的視角來探測五四的源流和影響。

之後的 1988 年，林先生的文集《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又在久負盛名的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更是掀起了重新思考現代中國與歷史中國之關係的浪潮。這本書與之前余英時先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士與中國文化》等，為處於又一波全盤性反傳統（稱為新啟蒙運動）運動之中的中國知識人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認知中國文化傳統，及其與現代中國甚至未來中國關係的新框架。認知決定態度，認知也引導未來。在所謂對黃色文明的憂思和對藍色文明的嚮往之中，包括後來電視政論片《河殤》對中國文化的全盤控訴之中，兩位先生嚴謹而深刻，並且態度平實的文化史論著，無異於振聵發聵的黃鐘大呂之聲。這種從學理和歷史邏輯出發的思考，與基於強烈的現實意願和政治意識形成的文化反思，自然有著雲泥之別。三十多年過去了，林先生和余先生的作品成為連接學術世界與公共文化空間可以不斷重返和重訪的經典，而當年那些萬人矚目、街談巷議的文化著作早已如過眼雲煙。由此可見，沒有學術支撐的思想論述註定只能是短命的曇花一現，如夜空中的煙花，雖璀璨奪目而反存續於一時而已。林先生在這本著作裡提出了他處理現代與傳統關係的一個新思路：「究竟甚麼是文化傳統『創造的轉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系統變成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的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⁷

到了 1990 年代初期，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 1980 年代充滿理想主義和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再一次站在歷

史的風陵渡口。面臨急劇的分化，有些被迫出國訪學或留學，有些主動下海衝浪，有些轉型做考據等遠離政治現實的學問，而那些仍舊留在學院而心在公共世界的知識人，內心是躊躇不安的，他們在重新思考面臨一個迅速到來的世俗時代，尤其是商業化浪潮，知識人尤其是人文學科知識人應該何去何從？這才有了張汝倫、陳思和、王曉明、許紀霖、朱學勤等學者參與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背後回應的就是在理想幻滅而商業社會興起、消費主義狂飆突進的時代，知識分子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⁸在這樣一個歷史和知識背景之下，林先生早年與臺灣自由主義之父殷海光的書信結集在中國大陸出版，給處於茫然、困惑和焦灼之中的中國知識人一種強烈的感召和刺激，書信錄所瀰漫的求知的熱忱、理知的清明和道德的勇氣等，對於萎靡不振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良性的示範作用。⁹用林先生宣導的比慢精神來說就是：「我們要做最深切、最根本的努力，要下決心，不要不爭氣，不要沒出息，要以最大的決心來跟別人比『慢』。……當你有這樣困思的經驗，當你在這樣的煎熬、這樣的自我批評、這樣堅強的精神支援之下得到一點實質成績的時候，得到一個突破性的學術理論的時候，你會發現，的確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你的努力並沒有白費，這種切實的成就感，會使你的心情變得不像別人那樣著急了，你真實地感受到只有在不棲棲遑遑的心情下才能為中國文化做一點實事。……『比慢精神』是成就感與真正的虛心辯證地交融以後所得到的一種精神。心靈中沒有這種辯證經驗的人，『比慢精神』很難不變成一個口號；相反地，有這種精神，自然會超越中國知識分子所常犯的一些情緒不穩定的毛病：過分自謙，甚至自卑，要不然則是心浮氣躁、狂妄自大。」¹⁰2017 年秋天，我抵達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學，曾

7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頁 324。林先生在這本書裡批評當時的一種才子文化等現象：「對中國文化傳統『創造的轉化』這份嚴肅而任重道遠的工作不是舞文弄墨、沾沾自喜的才子所能做的，也不是某些浮說游詞、語無倫次的『海外學人』所能做的；至於逢迎權貴、出賣靈魂的學術政客，他們更是我們文化界病態的標本。」同上書，頁 325。

8 可參閱許紀霖、羅崗等著，《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 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公司，2007），第二章，頁 72-90。

9 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10 林毓生，〈中國人文的重建〉，收入：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頁 406-407。

經一度有意到威斯康辛去拜訪林先生親炙教誨，也託丘慧芬教授將我閱讀由三輝圖書重版的《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而給《新京報·書評週刊》寫下的書評〈黑暗時代的燃燈者〉轉交給林先生閱覽和指正。那時候林先生已經生病，精神時好時壞，他在養老社區讀過之後委託其夫人宋祖錦女士給筆者回了一封極為簡短的信函，並親自簽署姓名。在某種意義上，這本書信錄對於像我這樣生於 1970 年代的中國大陸學人影響更大，讓我們在學生時代通過這本書，理解何為真正的學術研究和寫作，更讓我們感知到學術精神代際傳承的可貴。我曾在這篇書評中寫道：「50 多年過去了，重讀殷、林兩位先生當年散發著滾燙的情懷與求知精神的書信，就會怦然心動於黑暗時代的燃燈者是何等重要。殷海光與林毓生的交往相對於周輔成之於趙越勝（參見《燃燈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更不僅僅限於單向的精神和知識傳遞，師徒二人在冷戰時代隔海相望相守彼此溫暖的書信交流，更像是彼此都在扮演對方的燃燈者，點亮對方的心靈之光和智慧之光。在一個知識人噤若寒蟬的黑暗時代，在一個政治吞沒人心、制度毀滅人情的極端年代，唯有三兩讀書人之間的清雅自持和遺世獨立，在守護著無邊黑暗中的一線微光，讓自身不被黑暗所吞滅和毒化，讓來自真理和人格的溫暖之光給予孤獨的知識人以一種溫情與暖意。」¹¹

林先生曾經在講述其治學緣起的文章中，談到殷海光和海耶克對他的影響，這也正好印證了他反覆強調的進入一個有生命力的學術譜系和人文傳統的重要性。沒有依託的創造，註定是天馬行空不知所歸的空想。作為一個崇奉海耶克等學人思想的自由主義者，林先生對於自由與權威的思考曾經一度引起爭議，但若從他所紮根的西方思想傳統，以及對於中國現代性尤其五四新文化

的反思來看，更可以從他早年在書信中受殷海光先生對於自由與解放關係的闡釋之影響來看，這種異於常人的思考向度卻有著其持久的生命力和學術價值。他在多年後解釋〈論自由與權威的關係〉、〈再論自由與權威的關係〉兩篇文章的寫作緣起時，曾經鄭重指出：「解放本身並不能發展自由的文明。自由文明的發展需要秩序，而秩序的建立則需要正當的權威。」¹²他由此而反思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運動：「中國自由主義運動到目前為止，主要仍然停留在要求解放的層次上。它主要仍然是一個解放運動——一個要求在政治上、社會上與文化上從傳統的與現在的壓制性的『權威』與僵化的『權威』中解放出來的運動。」¹³在林先生看來，打碎了壓制性和僵化的權威，確實是清除了柏林（Isaiah Berlin, 1907-1997）所謂的「人為障礙」對個體行動自由的阻礙，但若人的內心被一些極度負面的情緒所裹挾和阻塞，個體仍舊難以獲得真正的自由。¹⁴因此，他在論述卡里斯瑪型權威時，特別強調個人的內在自由之重要性：「如果一個人的內在意識被怨恨、恐懼與無知所佔據，無論外在自由的架構多麼完美，他仍然是沒有自由的。人只有對生命有清楚的自覺、對生命的資源有清楚的自知的時候，才能發展內在的自由，他才能依據生命的自覺及其資源，以自由意志去追尋人生中道德的尊嚴與創造的經驗。」¹⁵林先生這種價值主張瀰漫著強烈的精英主義氣質，離普通人的日常生命有著很大的距離，而這種強調內在自由的方式，是否可以推論出內在自由相對於政治自由更具有根本性和優先性的價值，也是可以進一步商榷和討論的。從中國文化傳統而言，即使在政治再殘酷黑暗的世道，老莊式、禪宗式的哲學和思想似乎也可以為這種內在自由提供生命的支撐，而具有了這種遺世獨立的隱士自由之後，是否還會有足夠的道德勇氣和政治意願去為

11 唐小兵，〈黑暗時代的燃燈者〉，《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一個人的閱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20），頁 240-241。

12 林毓生，〈〈論自由與權威的關係〉、〈再論自由與權威的關係〉之緣起與二十年後的反思〉，收入：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頁 168。

13 林毓生，〈再論自由與權威的關係〉，收入：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頁 186。

14 關於柏林的消極自由概念及其在大陸的普遍誤解的澄清，可以參考馬華靈，〈被誤讀的與被誤解的：中國語境中的伯林〉，《天府新論》，2017 年第 2 期：142-150。

15 林毓生，〈再論自由與權威的關係〉，收入：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頁 188。

普通人爭取權利和自由，也是值得進一步去反思的。¹⁶

林毓生先生晚年重要的思考是對儒家傳統的烏托邦主義，以及毛式烏托邦主義的歷史反思，尤其是〈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一文具有廓清迷霧、撥雲見日之效。他不是簡單地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反思和批判烏托邦主義和極權主義，而是試圖深入歷史的脈絡和民眾的心靈來看烏托邦主義何以在現代中國攪動如此持久而廣泛的驚天巨浪。¹⁷就歷史脈絡而言，林先生認為，「在傳統宇宙觀已經動搖的情況下，愈是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民族主義影響的人，愈喜歡使用這種極強功效性的觀點來進行中西的對比，來衡量中西文明的成效。從這個觀點來看，既然傳統的政治秩序（或結構）無法有效地成為中國富強的根基，它自然失去了可信性（credibility）。與傳統政治秩序密切連結的符號與規範的可信性，也因此受到了極大的威脅。」¹⁸就現代中國的心靈而言，林先生洞察入微地描摹知識分子和民眾情緒的深層結構：「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是處於全面性、三重秩序危機之中，面對這樣千頭萬緒、急待解決的無數大大小小的問題，人們渴望著一個不受現實限制的、絕大的、超越力量的降臨。這個資源與力量無限的超越之源，不但能夠解決種種現實問題，而且當人們和他接觸時，感到奇理斯瑪震撼，感到自己渺小、畏蕙的生命，因與『神聖』

有了內在聯繫而得到洗滌、擴大與提升。」¹⁹

到了後五四的 1920 年代，五四時期引入的西方民主、科學和自由等觀念已經不能提供衝出家門的知識人和青年學生一種系統的指引和安頓，社會科學熱引人矚目，有關社會問題、家庭革命和民族主義等主題的討論牽引著年青一代走上十字街頭。²⁰余英時先生生前在接受筆者關於五四百年的訪問中，曾就後五四時期為何這麼多年輕人選擇馬克思主義指出：「民族激情是『五四』運動的真實動力，這是毫無可疑的。由運動而激起的兩大主要流派，無論是傾向西化還是傾向本位文化，都同樣為民族主義（或『愛國情感』）所驅使，這也是無可爭議的。如果要問兩派之間的分歧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只能說，這是出於心理上的不同：西化派抱著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理，而本位派則完全為民族自尊的心理所籠罩。但是民族主義在一九二零年代中葉所引導出來一些新動態，卻對『五四』新文化的進程發生了嚴重的影響。」²¹林先生也注意到了從 1920 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知識界的中心漸次向「左」移動，中式馬列主義漸次贏得許多知識分子的認同。他從紀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6-2006）和希爾斯那裡汲取審視現代中國左翼文化運動興起的靈感：「當一個社會發生了政治與社會危機，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出現文化危機的時候，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²²林先生對五四知識人的全盤性

16 鄂蘭（Hannah Arendt）也曾撰寫過關於自由和權威的論文，她也認為傳統的權威即使在反傳統的現代革命中也仍舊存在隱秘的影響，她對於權威也有著相對正面的評價：「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政治領域中：沒有權威，同時也沒有對權威的來源超越了權力的意識，那些掌權的人打算革故鼎新，卻沒有一個關於神聖開端的宗教信仰，面對人類共同生活的基本問題，我們沒有傳統的，從而自明的行為標準作為屏障。」詳見氏著，王寅麗譯，《過去與未來之間》（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頁 135。

17 張灝先生對於近代中國的烏托邦主義也有極為深刻的分析，參見張灝，〈轉型時代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收入：張灝著，任鋒編校，《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頁 236-264。

18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收入：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頁 17。

19 林毓生，〈中國現代性的迷惘〉，收入：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頁 380。

20 關於這方面，可以參閱筆者近些年發表的幾篇相關專題論文，如〈形塑社會想像的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問題」系列圖書為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後五四「社會科學」熱與革命觀念的知識建構——以民國時期左翼期刊為中心的討論〉，《史林》2022 年第 1 期；〈後五四的家庭革命與社會改造思潮——以《中國青年》《生活週刊》《申報》為中心的討論〉，《天津社會科學》，2022 年第 2 期。

21 唐小兵，〈「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實的歷史動力」——「五四」百年之際專訪余英時先生〉，收入：余英時，《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2），頁 172。

22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收入：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

反傳統運動為何會導向全面擁抱左翼意識形態的闡釋，極具啟發性和穿透力。在他看來，五四人物在尋求填補空虛的價值觀念，甚至意識形態：「當五四人物堅持要把傳統全部打倒的時候，他們在心理上正急迫地尋求能夠對未來提供確定的系統性政治導向與新的系統性思想的意識形態，以便填補內在的空虛與焦慮。」林先生這樣的邏輯論證也有力地解釋了五四時期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癥結所在：「五四全盤化反傳統主義的心理與邏輯後果則是：堅持這樣意識形態的人，在心情上與思辨的邏輯上，不容易接受自身帶有未扣牢部分（loose ends）的思想，而容易被自我聲稱對未來能夠提供確定的系統性政治導向與新的系統性思想的強勢左翼意識形態所吸引。那樣的強勢意識形態，對這些在緊迫環境中無暇對其做審慎研究的人而言，顯得特別具有指導行動、導向未來的系統性，以及能夠應付（或解決）一切難題的整體性。」²³

林先生生前最後一本文集以《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為題，恰如其分地彰顯了林先生一生學思的自我身分認同。他從殷海光、海耶克等導師那裡汲取的是西方學術與思想的營養，但最終的研究卻聚焦到探尋自由主義在中華大地何以紮根並發芽成長的核心問題，²⁴ 思慮的是哪些中國文化傳統的質素可以接引到現代中國的價值系統並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作為一個西化痕跡很明顯的學人，其研究卻始終不脫海耶克所言的「個人關懷

（personal concerns）」何為知識貴族？林先生曾經這樣闡釋其內涵：「知識貴族不是什麼社會貴族，也不是經濟貴族。知識貴族的精神乃是——不是多數人做得到的——在『諸神戰爭』的現代性文化中，始終堅持忠於知性神明而無懼於其他神祇的精神。」這恰恰也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所宣導的清明理性和智性誠實的精神。²⁵ 眾所周知，林先生是深受韋伯思想影響的知識人。²⁶ 他在闡述殷海光和海耶克對他思想與人格的影響時，其實也就闡明了這種知識貴族的精神氣質何以養成。林先生在接受《南方人物週刊》記者施雨華專訪時，曾經坦誠地說到兩位恩師的影響：「殷海光先生的身教與言教給我的則是：經過西方自由主義轉化的中國知識分子道德精神的召喚。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看到同胞的苦難與政治上和社會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必然感同身受，不能自己。他會盡一己之力以言論介入公共事務，希望能夠指出在公共領域之內的諸多問題的解救之道。這種入世的使命感使他不消極、不氣餒、不自怨自艾，不上山靜思，也不玩世不恭。另外一個殷先生的精神特徵是：在政治權力與社會及經濟勢力之前，保持著人格的獨立與真誠。這種公共領域之內的道德完整性，乃是中國知識分子最主要的精神資源。」²⁷ 而海耶克則傳遞給青年時代的林先生以一種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為知識而知識的理知傳統：「海耶克先生給我的是知識貴族精神的召喚。他的

林毓生思想近作選》，頁 8。

²³ 同上，頁 45。

²⁴ 文集編選者丘慧芬教授對於林先生一生的學思與關切做了極為準確的概括：「這些數十年的論述，代表了作者以學術思想的言說介入公共議題的努力，彰顯的是他自 1950 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自覺的追隨殷海光先生以堅持個人自由與憲政民主是中華民族惟一的出路來作為自己的學思志業。這些論述同時也顯示出作者從 1960 年開始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讀博士的時期，因為有海耶克先生的個別指導，尤其是受到海氏閥富論著當中有關探究西方自由主義如何建基於法治及『自發秩序』的啟發和影響，才能夠對自由主義在中國前途的討論提出以往中文世界從未觸碰到的幾個關鍵議題，並進而給予嚴謹精緻的闡釋，以求理清過去對於建設憲政民主的一些含混看法。」詳見：丘慧芬，〈編者序：林毓生對建設現代中國政治及文化秩序的論述與貢獻〉，收入：林毓生著，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頁 xiv。

²⁵ 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等譯，《學術與政治：韋伯作品集 I》（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²⁶ 林先生有專文〈政治家的條件——兼論韋伯的「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收入：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他討論魯迅政治觀的文章也深受韋伯影響，見〈魯迅政治觀的困境：兼論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活力與限制〉，《文星》112（1987.10）：24-32。

²⁷ 林毓生，〈自由主義、知識貴族與公民德行〉，收入：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頁 338。

身教與言教給我一個重要的啟示：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不存在應該或不應該追求的問題，只能盡最大的努力。……追求知識尤其獨立性與自主性，用英文來講，可以 intellectual autonomy 來表達。這種知性活動不受外界（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勢力的干擾，也不會為了趕時髦而從事這種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一旦有所發現，即使不被外界所瞭解，甚至被外界誤解、曲解，也只能堅持下去。」²⁸ 林先生以一生的學術思考、教學、

寫作、交談、演講等身體力行地做到了這一點，誠然是華人世界人文學術傳統薪火相傳的燃燈者。如今，他和余英時先生、張灝先生點亮的燈光仍舊照亮、溫暖和滋養我們，並激勵著我們守先待後，以一種韋伯式的知性誠實和殷海光式的道德勇氣，在這個至暗時刻的世界，量才適性，博學知服（余英時先生語），做一個有尊嚴和內在價值的知識人。

28 同上，頁 336。與林先生有過密切交往的許紀霖教授在悼念文章中曾如此寫道：「上世紀 80 年代的啟蒙陣營尚未分化，對自由主義多茫然無知。林毓生的著作讓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哈耶克的大名，也通過他瞭解到哈耶克的自由保守主義的基本常識。從某種意義上，在大陸，林毓生是引入哈耶克思想的第一人。他是哈耶克的嫡傳弟子，終身信守自由保守主義的理念。」詳見：許紀霖，〈思想史留下了他的名字〉，《財新週刊》，2022 年 11 月 28 日，頁 96。

漢學研究中心出版品

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論著類第 17 種

耿立群主編／漢學研究中心編印

民國 110 年 9 月出版

新臺幣 500 元

本書為慶祝漢學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周年，邀請各篇章撰稿學者包含王汎森、蔣秋華、季旭昇、李王癸、廖棟樑、錢瑋東、梅家玲、黃美娥、許雪姬、王鴻泰、呂妙芬、劉靜貞、劉士永、林麗江、施靜菲、盧慧紋、邱函妮、林啟屏、鍾彩鈞、劉宇光、李豐楙、黃應貴、潘鳳娟等專家學者（依篇章順序排列）各撰文。他們不僅是各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且多曾以不同身分，藉由各類型學術活動，參與了漢學研究中心四十年來豐富的歷史，彰顯漢學研究中心作為國際漢學研究與交流平臺的機制重要性，也讓臺灣學術自由基礎更為穩固。

